

齐家之思：“家国同构”视阈下的中韩家庭小说*

——以《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为中心

金梦**

目 录

1. 引言
2. “家国同构”的寓言化叙事机制
3. “齐家治国”——《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的经世理想
 - 1) 《金瓶梅》——不修其身，不济其家
 - 2) 《谢氏南征记》——欲治齐国，先齐其家
4. 结论

中文摘要

由于中韩古代是以“家天下”为模式的宗法制社会，使得以“家国同构”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小说成为齐家治国的文化寓言文本，表现出共同的文化品格。而《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作为中韩两国家庭小说之嚆矢，作品中的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俨然构成了一种互文隐喻的关系。从“齐家”的观点来看，两部作品都侧重表达了“家齐而治国”的理念，通过取喻的方式回应历史，以及小说叙述本身所寄予的经世思想。这不仅为后世中韩家庭小说的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东亚叙事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关键词：《金瓶梅》，《谢氏南征记》，家国同构，齐家，治国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XZW009)：《红楼梦》和四大奇书在东亚传播与接受研究

** 연변대학교 조한문학원 아비언어문학학과 박사수료

1. 引言

家庭小说，是指通过人物的家庭生活以及家族的兴衰荣枯来反映社会人生，反映某一时期社会本质生活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家庭生活类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大流派世情小说的一个基本类型。成书于16世纪末的《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以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¹⁾，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市侩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再现了当时社会民间生活的面貌，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揭露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后以《金瓶梅》为开端，明清时期产生了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为代表的长篇家庭小说系列。

韩国的古典家庭小说，也是以家庭秩序为中心、说尽天下事为特点。其中插入了盘根错节的各大家族，或者是一个家族代代传承、或者是亲属之间、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男女主人公的英雄事迹，妻妾间的争宠、宫廷斗争等多幅画面，以构成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²⁾17世纪后半期西浦金万重所著的《谢氏南征记》作为韩国文学史上的首部长篇家庭小说，主要讲述了中国明朝时期，刘熙的儿子刘延寿少年及第成为翰林学士。随后，与德才兼备的谢氏成亲多年未得子。为续后嗣谢氏为丈夫纳乔氏为妾。但是狡猾奸诈的乔氏用阴谋诡计诬陷谢氏，霸占了其正室之位，谢氏被逐出家门。此后乔氏与情夫私通，陷害刘延寿并使他被流放异地，后带着家产和情夫逃亡的途中遇到强盗，全部财产被劫持，陷入窘境。另外，刘延寿逢大赦后与谢氏破镜重圆，处决了乔氏与她的情夫。小说借一个明代士大夫刘延寿家庭的矛盾冲突，影射肃宗朝廷的混乱和腐败。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中韩家庭小说方面的研究甚鲜。其中李娟在其论文

1)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

2) 장효현, 『한국고전소설사연구』, 서울: 고려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2016.8, 第259页.

《韩国古代家庭小说文化解读》³⁾中,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韩国古代家庭小说的文化成因、韩国古代家庭小说主题的文化指向、韩国古代家庭小说人物的文化内涵。在其与他人共著的另一篇论文《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的文化意蕴》⁴⁾中,认为“家庭小说”的这种“平凡”叙事突破了韩国古代传统的小说叙事观念,蕴含着作家看待生活的独特价值观和心态。并通过剖析朝鲜朝后期的作品、人物塑造及作者,以体现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作品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张迪、吴世峻在其论文《韩(朝)〈玩月会盟宴〉与中国小说之比较》⁵⁾中,认为李氏朝鲜时代的长篇家门小说《玩月会盟宴》明显受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体现了朝鲜时代封建社会对“礼”“孝”的正统认识。陈美琪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韩家门小说比较研究——以〈歧路灯〉和〈玩月会盟宴〉中的伦理观为例》⁶⁾中,认为两部作品的思想渊源都源自于儒家伦理观里的“孝悌忠信”,只是《歧路灯》中的表现更为透彻,而《玩月会盟宴》中体现得更纯粹、正统。延边大学的杨杰在其硕士毕业论文《〈玉麟梦〉研究——兼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⁷⁾中,分析了《玉麟梦》的主题思想、家庭伦理关系以及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并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玉麟梦》的文本特质及其与中国小说的影响关系,以及韩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选择性的吸收与发展。

韩国学界中,杨胜民(音译)在其论文《通过〈金瓶梅〉看〈谢氏南征记〉》⁸⁾中,通过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论证了《谢氏南征记》在《金瓶梅》的继承体系中,是东亚通俗小说的“一环”。金秀妍(音译)在其论文《东亚叙事传统与世情小说——以〈金瓶梅〉、〈谢氏南征记〉为中心》⁹⁾中从叙事学的角度,探

- 3) 李娟,〈韩国古代家庭小说文化解读〉,《社会科学战线》第8期,2009,第189-192页。
- 4) 李娟,杨杰,〈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的文化意蕴〉,《当代韩国》春季号,2010,第72-79页。
- 5) 张迪,吴世峻,〈韩(朝)《玩月会盟宴》与中国小说之比较〉,《大连民族学院学报》第16卷第6期,2014.11,第628-631页。
- 6) 陈美琪,《中韩家门小说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
- 7) 杨杰,《〈玉麟梦〉研究》,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2。
- 8) 양승민,「〈금병매〉를 통해 본 〈사씨남정기〉」,『고소설 연구』 제13집, 고소설학회, 2002, 83-109쪽.
- 9) 김수연,「동아시아 서사 전통과 세정소설(世情小说): 〈금병매〉·〈사씨남정기〉를 중심으로」, 『고소설 연구』 제13집, 고소설학회, 2002, 83-109쪽.

讨了东亚叙事传统下世情小说的风貌。金贞女在其论文《韩中人情小说中的观音文学形象比较——以〈谢氏南征记〉与〈金瓶梅〉为中心》¹⁰⁾中通过平行研究,探讨了两部作品中观音的文学形象及意义。江南大学的陈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谢氏南征记〉的形成与中国家庭小说——以〈谢氏南征记〉、〈金瓶梅〉、〈林兰香〉为中心》¹¹⁾中,认为《谢氏南征记》的创作,必定借鉴了中国家庭小说。因此,通过比较《谢氏南征记》与《金瓶梅》、《林兰香》叙事结构与人物形象中的相似点,以揭示《谢氏南征记》的形成是受了中国家庭小说的影响。

中韩古代都是以“家天下”为模式的宗法制社会。这也使得家国同构的延展性体现在中韩家庭小说创作中,具体体现在家庭所具有的丰厚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包容性,因此也就奠定了家庭小说的文化品格。《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作为中韩家庭小说之嚆矢,作品中的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俨然构成了一种互文隐喻的关系。从“齐家”观点来看,两部作品都侧重表达了“家齐而治国”的理念,通过取喻的方式回应历史,以及小说叙述本身所寄予的经世思想。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家国同构”的叙事机制下,《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中所寄予的经世理想,并进一步阐明中韩家庭小说的叙事与“齐家治国”的思想关联。这不仅为后世中韩家庭小说的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对东亚叙事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2. “家国同构”的寓言化叙事机制

家庭作为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其家庭关系、家庭制度及伦理观念,必然从各

으로」, 『한국어문학연구』 제59집, 한국어문학회, 2012, 265-301쪽.

10) 김정녀, 「韩中人情小说에 나타난 观音의 문학적 형상 비교---〈谢氏南征记〉와 〈金瓶梅〉를 중심으로」, 근역한문학회, 汉文学论集 제43집, 근역한문학회, 2016, 311-339쪽.

11) 진신, 「〈사씨남정기〉 형성과 중국 가정소설 ---〈사씨남정기〉·〈금병매〉·〈임난향〉을 중심으로」, 강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6.

个方面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关系以及政治制度,具体到社会的文明进程。中韩传统社会中,按照“家天下”的“家国同构”模式构造,“家为国之本”,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二者在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伦常原则等方面都具有 consistency,国与家的相通使人们在遵循家庭等级制的同时,也顺从了政治制度中的等级划分,家庭伦理亦扩大至礼法纲常,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家国同构”的延展性体现在家庭小说这一“确凿的事情是通过虚构来表现”的艺术形式中,便形成了家庭小说的创作特质。¹²⁾家庭小说以家庭、血缘视角切入文化命脉,潜入社会历史文化底蕴,把时代变换寓于家庭日常之中。所以中韩家庭小说,不论篇幅的长短,都不拘囿于家庭生活本身,而是向外延展至社会生活,力求以家庭的日常生活、家庭命运的兴衰、个体的生存感悟来投射、隐喻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因此,家庭小说对社会的认知与其他类型小说有所不同,是着重从家庭日常生活角度出发,对“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进行审视。而《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中的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显然也构成了这种互文隐喻的关系。

《金瓶梅》在第一回就交待了国家当时的状态。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¹³⁾

可知当时的世道艰难,整个国家处在一个低落的状态。而在这艰难的世道之下,西门庆从一开始就是以“有钱的恶人”形象登场。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第二回)¹⁴⁾

12) 李娟,杨杰,〈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的文化意蕴〉,《当代韩国》春季号,2010,第75页。

13) (明)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8,第3页。后续引用原文只标记作品名称及页数。

由上文可知，虽然西门庆是破落户出身，但由于其“善于钻营”，通过“把揽说事”积累了一定财富，使得西门一家正处在上升期。并且随着故事走向的发展，西门一家与国家也都发生了变动。

大德西门亲家见字。馥情不叙。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连累朝中杨老爷俱被科道官参劾太重。圣旨恼怒，拿下南牢监禁，会同三法司审问。其门下亲族用事人等，俱照例发边卫充军。生一闻消息，举家惊惶，无处可投。（中略）生令小儿另外具银五百两，相烦亲家费心处料。容当叩报，没齿不忘。（第十七回）¹⁵⁾

上文可知，因为忠臣宇文虚弹劾奸臣杨提督，连罪了女婿陈经济一家，因此西门一家也受到了牵连。从国家层面来看，忠臣弹劾奸臣，奸臣势弱，国家运势处于上升阶段。与之相反，西门一家由于依附奸臣，怕被株连，处于低潮期。

在《金瓶梅》第三十回，西门庆一家迎来了鼎盛时期。李瓶儿为西门庆生下一子，同时西门庆被任为副千户。

当日西门庆进房去，见一个满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净，心中十分欢喜。合家无不欣悦。（中略）
正热闹一日，忽有平安报：“来保、吴主管在东京回还，见在门首下头口。”不一时，二人进来，见了西门庆报喜。西门庆问：“喜从何来？”二人悉把到东京见蔡太师进礼一节，从头至尾诉说一遍，（中略）西门庆看见上面衔着许多印信，朝廷钦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户之职……¹⁶⁾

由于西门庆膝下只有一女，因此李瓶儿为他诞下麟儿，西门家后继有望，使得西门庆异常开心。这时又传来自己当官的好消息，更是喜上加喜，西门家的家运迎来了巅峰时刻。但是，西门庆的官职是由他给蔡太师送礼得来的。这

14) 《金瓶梅词话》（上），第25页。

15) 《金瓶梅词话》（上），第186页。

16) 《金瓶梅词话》（上），第349-350页。

与当时卖官鬻爵成风的国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第三十回）¹⁷⁾

以上可知，国家正处于黑暗时期，而西门庆一家却达到了鼎盛。也就是说西门庆的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呈反向趋势发展。并且西门庆利用自己的官职，低买高卖，逃税漏税，累积了更多的财富，西门庆迎来了高光时刻。与此相反，国家却因奸人当道，民不聊生，以致风气日下。

第七十九回中，西门庆因贪欲而亡，西门一家开始走向衰落。而国家却逐渐从困境中脱离出来。

不一时，韩道国走来作揖，已是掺白须鬓，因说起：“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第九十八回）¹⁸⁾

西门庆死后，西门家也在逐渐没落。这时国家却因提拔忠臣，罢黜奸臣，形势得到好转。最终回结局如下：

那到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国立了张邦昌在东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钦宗两君北去，康王泥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拜宗泽为大将，复取山东、河北。分为两朝，天下太平，人民复业。（第一百回）¹⁹⁾

17) 《金瓶梅词话》（上），第344-345页。

18) 《金瓶梅词话》（下），第1330页。

19) 《金瓶梅词话》（下），第1365页。

而《谢氏南征记》也试图通过刘氏家庭命运的走向映射国家命运的走向。例如在第一回中提到：

刘熙事世宗皇帝，为礼部尚书。文章德望为一世名臣，与太学士严崇论议不合，称老乞退。天子笔勉许之，特加“太子小师”，以示尊崇之意。²⁰⁾

从上文可知，刘延寿的父亲刘熙作为高官，德才配位，甚得世人推崇。却因与严崇政见不合，被迫致仕。因刘熙致仕，刘家的家庭运势处在了低落状态。而这里的“严崇”作为“严嵩”的影射，可见当时皇帝疏于朝政，奸臣专权，国势也处于低落期。

十五登第，考官初擢为第一。嫌其年少，置一等第四，为翰林编修。（中略）天子览之，嘉其谦退之志，遂下诏报上，特以本职，给假五年，“益读圣贤之书，讲求志国之道，待年二十辅朕焉。”（第一回）²¹⁾

小姐入刘家之后，尽孝以事尊姑，竭诚以奉祭祀，使奴婢以恩，治家以法，琴韵调和，佩玉琅然。（第二回）²²⁾

由上文可知，刘熙之子刘延寿少年及第，并娶了贤德的谢氏为妻。这也说明了刘家的运势开始上升。虽然，上文没有详细体现国家当时的情势，但皇帝对刘延寿的任命与嘉勉，足以说明国家也处在上升的状态。

翰林服阙供职，累陈疏章，极论朝廷得失。严丞相不悦，力沮之。故累岁不还秩。谢氏年至三十三，结褵且将十载，而无一子女，心甚忧之。且自念：气质清弱，恐难生育。（第二回）²³⁾

刘延寿因与严丞相政见不合，受其排挤，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可知当时奸

20) (朝鲜) 金万重著, (朝鲜) 金春泽译, 韦旭升校注, 《谢氏南征记》,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7, 第1页. 后续引用原文只标记作品名称及页数。

21) 《谢氏南征记》, 第2页.

22) 《谢氏南征记》, 第10页.

23) 《谢氏南征记》, 第10页.

臣当政，忠臣处境艰难，未来前途堪忧。巧合的是，刘氏夫妇婚后近十年无所出，刘家无后，未来渺茫。因此，谢氏主动为刘延寿娶乔氏为妾，以延续后嗣。而乔氏为了自己的利益，陷害谢氏，使其被逐出家门。并且联合外男，构陷丈夫刘延寿，致其流放。与此同时，严崇以仙道迎合上意，固其恩宠。以海瑞为首的忠臣良将，为皇上进谏，被罢免充军。由此可见，无论是刘氏家庭还是国家运势都跌到了极点。

故事的结尾，刘家与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逆转。先是黄陵庙前谢氏昏厥，遇妙姬并被其所救，与此同时，刘延寿也在濒死之际被救。并因朝廷册封太子大赦天下，与谢氏重逢。之后他重返朝堂，迎回谢氏，诛戮恶妾乔氏。后来刘家在他与谢氏的带领下门户之盛，一时无比。国家也因奸臣被逐，并以公正之法选拔人才，得以稳定太平。

综上可知，《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中的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俨然构成了一种互文隐喻的关系，从家庭方面来看都是因为反面人物，引起家庭危机，并通过正面人物进行解救；国家方面也是因昏君奸臣当道、国势衰落以至于亡国，也因有忠臣良将，得以缓和甚至改变危局。其中西门庆与刘延寿作为两个家庭中的掌权者，他们个人的升降，不仅决定了家庭的升降，更有与帝国天下的盛衰刻意交织在一起的意象，在许多章节里都直截了当地一语道破。这也说明了中韩家庭小说多从“齐家治国”的原则出发，力求以个体的生存感悟、家庭与家族的盛亡兴衰投射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状况，从而表达本身所寄寓的经世理想。

3. “齐家治国”——《金瓶梅》与《谢氏南征记》的经世理想

《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²⁴⁾《金瓶梅》与《谢氏

24) 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6.1，第7页。

南征记》作为文人创作的家庭小说²⁵⁾，他们自小就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比起普通民众对社会及国家有着更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将“修齐治平”作为意识形态，更能体现小说叙述本身所寄予的经世理想。

1) 《金瓶梅》一不修其身，不齊其家

16世纪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而《金瓶梅》的诞生更是与16世纪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在政治上,16世纪的明朝在内政上显露出了明显的危机。嘉靖和万历二帝都是刚愎自用的人物，虽然朝中有张居正等身怀经世之才的政治家，但也不乏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严嵩之流。朝廷大臣之间的正邪之争，并不是16世纪明朝政治的全部。这一时期还是一个宦官专权的时代，产生了16世纪明宫著名的“三大案”。16世纪的明代经济也处在大的动荡之中，商业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市的繁荣、人口在百年内剧增两至三倍，促使明朝政府施行一系列财政上的改革。“一条鞭”税法的推行，国家经济向银本位的转化，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郑和下西洋海外探险的试探，种种都引起了思想史上的剧烈变动。

16世纪的前半叶，正是王守仁学说播及天下的时候。王氏的学说打开了明儒学案的新天地，并成为显学。程朱陆王承前启后，其影响渗透到明代思想史的各个方面。在认定基本思想倾向是“儒”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嘉靖崇道和万历兴佛，正是16世纪明代思想史上著名的“三教合一”思潮的鲜明写照。

面对着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巨大变动，《金瓶梅》借宋喻明，刻意造出了个人小天地的垮台与整个王朝崩溃之间的互相对射，接触到了国家大事的边缘。凸显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病症，即商人阶层兴起后，人欲追求如何导致传统

25) 上述中关于《金瓶梅》为文人创作是基于“《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详见于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5，第146-147页。

儒家世界面临价值体系转换和道德观念解体的失序危机。

小说《金瓶梅》从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情色为祸”的命题，并通过一个新兴商人家庭的盛亡兴衰，凸显了明朝末期传统儒家“齐家”理想实践所面临的重大困境。小说中并不仅仅是关注西门庆个人在声色追求中所造成的身体损耗，同时也格外重视一个盛极一时的官商家庭，如何在西门庆纵欲身亡而沦于分崩离析的悲剧下场。而关于西门一家面临兴亡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齐家”的中心而展开。

西门庆的“齐家”方面有许多问题，可以说他违背了“齐家”的古训。《大学》有言：“齐其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²⁶⁾晚明的思想界强调“心”是修养的出发点，王守仁曾道：“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²⁷⁾，由于西门庆“不正其心”，其在“修身”、“齐家”方面也出现了混乱。小说对西门庆在这方面的败行，提供了大量事实。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不但缺乏孔孟名教的学问，而且是个半文盲。另外许多评论，也都奚落他的不失“市井”本色。

再看西门庆“齐家”的理想，就会发现一种权威丧尽的相似情景。事实上，整部小说的很多地方可以当作上引的那段《大学》卷首语的注释来读。西门庆在故事进程中不断播撒种子，到头来却落得个断子绝孙下场，正中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格言，无疑是颇有深意的。“断后”和“乱伦”始终是《金瓶梅》的关键问题，这是对正常的人伦为害最烈的颠倒。无论是在修身，还是齐家方面。《金瓶梅》都发生了“乱”，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再三强调，我们就不难看出，“乱伦”这一词语实际上是总结了小说在各方面的紊乱。从这一观念出发，就能理解为什么西门庆的小天地里有那么多的“毛病”。正是在儒家思想至关紧要的“齐家”问题上，无论是在“知”的方面，还是“行”的方面，都违反了“修心修身”这一核心教导。

由于西门庆在“齐家”方面能力欠缺，这也导致他的“治国大业”也是一团糟。他身为官员，却不遵守为官之道。不仅仗势欺人、卖官鬻爵，还贩卖私

26) 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6.1，第27、29页。

27) 出自于王守仁《传习录》卷上中的《门人薛侃象》。

盐，谋取暴利。大半时间里，他根本不去办公，把公务完全丢给一班欺上瞒下的下属去处理。作为一名提刑官，他所从事的主要是“损下益上”的工作。这个词在小说正文中反复出现，在张竹坡的评论里也随处可见。

把西门庆个人的升降与帝国天下的盛衰刻意交织在一起的意象，在许多章节里都被直截了当地一语道破，在那些章节里，常常把西门庆与整个天下统治者的形象，用各种隐喻的方式互相比拟。也就是说，将西门庆比作君王的替身，他并不是统治者的模范，而是担任了一个“昏君”的角色。西门庆在他自己小天地里表现出来的败德恶行，应对着整个天下的分崩离析。而作者利用虚构的叙述想要表达的，正是自我与天下纲纪互相关联着的儒家观念，它既是《大学》贯穿全篇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的思想。根据这一观点，皇帝的一言一行是整个天下层构体制的拱顶石，皇帝一旦有失于履行他的职能，整幢帝国大厦就要坍塌下来，就如小说中反复述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张竹坡也曾好几处暗示过，西门庆作为“末代昏君”的形象。这种取喻，恰好也回应了明朝万历帝过度放纵、刚愎自用，专宠郑贵妃的史实。并且从反向角度证实了“修身齐家”对个人、家庭及国家之间的和谐发展有着强烈的模范意义。

2) 《谢氏南征记》——欲治其国，先齐其家

关于《谢氏南征记》的写作动机，朝鲜朝后期的著名实学家李圭景（1788-1856）在其著作《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曾提到：“为肃庙仁显王后闵氏巽位。欲悟圣心而制者云。”²⁸⁾也就是说，这是为仁显王后复位，借以讽劝肃宗省悟的政治目的小说。

作者金万重（1637-1692）正处于当时朝鲜朝党争最严重的时期，并且他身

28) 古典刊行会编，《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第七卷，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第230-231页。

为西人老论派，仁显王后闵氏与他同属一个阵营。因此闵氏的复位更是关系到西人派在政治上的执政权。肃宗与仁显王后婚后数年无子，就将张氏收入后宫。入宫后的张氏深得肃宗宠爱，张氏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扩大。张氏与南人勾结，为自己奠定朝堂基础。金万重极谏肃宗不能过度宠爱张氏，却不为采纳，反遭流放。肃宗14年（1688），张氏生下王子，大赦天下，金万重被重新召回。同年肃宗册封张氏之子为世子，并册封张氏为禧嫔。对此西人派上疏反对，肃宗不仅没有接受西人派的上疏，反而赐死了西人派领袖宋时烈，金万重也被发配去了南海绝岛。这个事件就是肃宗15年发生的“己巳换局”。同年五月二日仁显王后被废，贬为庶人并被遣送回本家。十三日禧嫔张氏被册封为王妃。南人为报复“庚申大黜陟”时的参与者，大部分的西人派都被“赐死、斩刑、围篱安置、罢职”。从此西人派退出了政界。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金万重切实感受到了政治的混乱及权力变动的无常，并于贬谪中创作了《谢氏南征记》。

小说讲述了一个妾室勾结恶人陷害正妻的故事。它的情节设计与肃宗废后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女主人公谢氏的人生遭遇与仁显王后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贤德的淑女，因无子劝丈夫纳妾（纳妃），反被妾（妃）陷害，失去了丈夫，受尽磨难，最后才得以冤情昭雪，夫妇复合，恶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并且张氏出生于庶人阶层，是倚仗貌美与子嗣才深得肃宗宠爱，这与恶妾乔氏的角色也是比较相符的。还有就是刘延寿的姑母杜夫人这一人物形象与深明大义的肃宗之母明圣太后有所相似。杜夫人自始至终都在支持谢氏，厌恶乔氏。而明圣太后也一直都在维护闵氏，逐出张氏。张氏后来借助南人支持夺取王后之位，与乔氏和“南方佳士”董青、“南方人”冷振等人内外勾结陷害谢氏类似。尤其是小说对刘延寿这一人物的描写和评价上，非常小心谨慎，并没有丝毫贬损之意。特别是刘延寿可以及时省悟，并且知错就改迎回谢氏这一点，接近了肃宗省悟、复位闵氏的行为。据此，可以推断《谢氏南征记》是对肃宗时期张禧嫔迫害仁显王后闵氏的影射。从小说所体现的现实混乱的政治局势与朝堂的腐败，以及贤良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可以确认金万重创作的动机含有讽劝

肃宗、整饬朝纲的政治寓意。

金万重出生于官宦世家，其曾祖父金长生是朝鲜朝名儒。因家学渊源，金万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金万重关于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的思考是以《大学》中的原理为基础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金万重依据儒家理念，认为家庭美满和睦，国家才能治理好；而家庭和睦的基础是一家之主的自我修养。《西浦年谱》中曾载道：“府君（金万重）曰：‘孝、显两朝，不置后宫，故闾巷之人以为创见……古者此等浮言多出于女宠之时，如文王《关雎》之时，则安有此言乎？……圣朝固无相近之事，则自上不必有所激恼，但益加工夫於修身齐家之道。”²⁹⁾在《谢氏南征记》第二回“诗咏关雎穆木琴奏霓裳羽衣”中谢氏与杜夫人的对话中，杜夫人也提到了：“《关雎》、《穆木》之化，虽是太姒不妒之德，亦本乎文王之不偏爱而诸姬自无怨耳。若外无文王之德，则虽有太姒，不得施其化矣”。³⁰⁾由此可见，金万重借周文王与贤妃太姒的典故，指出作为君王“得性情之正”的重要性。也就是正夫夫人伦之序，得性情之正，才能修身齐家。

刘延寿就是因为疏忽了这样立身处世的大节，有违了儒家的“齐家之道”，几乎给家门带来了家破人亡的后果。正如第三回末尾所说：“今刘翰林内嬖奸邪之媵，外有不正之客，又有奸婢用事于其间，丑行狼藉，辱及门户，岂不慨然哉！”³¹⁾小说写谢氏被刘翰林逐出家门时众邻居曾相谓感叹：“夫妇之间，岂不难哉！”³²⁾这是因为在外人看来，以谢氏之贤，刘延寿之敬，世间没有夫妻和他们相比。如今却造成这种局面，可见夫妻见得相处之道，并不是似表面那么容易。作为妻子，谢氏已堪称典范，也是她主动为丈夫纳妾延续后嗣；作为丈夫，刘延寿最初与谢氏相敬如宾，但在乔氏一进门就被其迷惑，并且识人不

29) 김병국·최재남·정운채 공역, 『서포연보』, 서울:서울대학교 출판부, 1992, 321쪽.

30) 《谢氏南征记》，第11页.

31) 《谢氏南征记》，第20页.

32) 《谢氏南征记》，第36页.

清，几近家破人亡。可见其并没有遵守“齐家之道”。在政事上，最初的他胆小懦弱，缺乏正义感。他排斥严崇一党，却不敢与他冲突。而且在后来谏议大夫海瑞因弹劾严嵩，被发配充军的事情上，刘延寿虽然为其上疏求情过，但后来怕皇上怪罪，便称病在家门也不出了。在他经历了一系列磨难后，幡然醒悟，并在谢氏的鼓励下，重新进入朝堂，最后升至丞相。小说正是以一个虚构的人物故事，说明了“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所谓君子欲治其国，先齐其家。

由此可见，无论是《金瓶梅》还是《谢氏南征记》，都将“齐家治国”作为经世理想，这也可视为中韩家庭小说叙事生成的重要思想因素。

4. 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金瓶梅》，还是《谢氏南征记》，作者都是通过小说叙述追求改造时世时所寄寓淑世理想，则更可见小说叙述背后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关怀和政治期望。而其中“修齐治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当如《孟子·离娄上》所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³³⁾而这样的政治期望，正可视为主导《金瓶梅》、《谢氏南征记》等家庭小说叙事生成的重要思想因素。从家国同构的观点来看，家庭小说中的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俨然构成了一种互文隐喻的关系结构时，其中个人、家庭和国家在叙述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投射现象无疑格外引人深思。而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其所要体现的经世理想最终便落实在个人自我修身的吁求之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关怀。而这种政治关怀，也可视为中韩家庭小说叙事生成的重要思想因素。

33) (宋)朱熹集注,《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第92页。

參考文獻

著作：

- 김만중, 『서포만필』, 서울: 경인문화사, 1973.
- 장효현, 『한국고전소설사연구』, 서울: 고려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2016.8.
- 陈大康著, 《明代小说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 (朝鮮)金万重著, (朝鮮)金春泽译, 韦旭升校注, 《谢氏南征记》,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7.
- (明)兰陵笑笑生著, 陶慕宁校注, 《金瓶梅词话(上、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8.
- (美)浦安迪 著, 沈亨寿 译: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北京: 三联书店, 2015.9.
- 王国轩译注, 《大学·中庸》,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1.
- (宋)朱熹 集注, 《孟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8.

期刊论文：

- 김수연, 「동아시아 서사전통과 세정소설 : <금병매>·<사씨남정기>를 중심으로」, 『한국어문학연구』 제59집, 한국어문학회, 2012.
- 양승민, 「<금병매>를 통해 본 <사씨남정기>」, 『고소설 연구』 제13집, 고소설학회, 2002.
- 成海霞, <明清时期长篇家庭小说研究述评>,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3期, 2004.6.
- 梁晓萍, <明清家庭小说的体裁与叙事倾向>, 《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 2006.7.
- 李娟, 杨杰, <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的文化意蕴>, 《当代韩国》春季号, 2010.

学位论文：

- 金香淑, 《朝鲜朝家庭伦理小说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 周雪萍, 《韩国汉文小说<谢氏南征记>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Abstract

Thought of regulating the family: United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s well as Chinese and Korean domestic novel
— Centering the Golden Lotus and Sasinamjeonggi

Jin Meng

Domestic novels characterized by "united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became cultural allegories writing the principles of regulating the family, ruling the state because ancient China and Korea were patriarchalisms with "one's family dominates the wide nation" as the model, thus showing common cultural characters. Family fate and the national fate of the Golden Lotus, and Sasinamjeonggi, which are the precedents of Chinese and Korean domestic novels, constitute an relationship of intertextuality and metapho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gulating the family", both works focus on expressing the concept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regulating the family". The two works responded to history through allusions, and narrated practical thoughts t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express. This writing pattern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arrative mode of Chinese and Korean domestic novels of later generations, but also had indelibl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Key words : The Golden Lotus, Sasinamjeonggi, united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regulating the family, ruling the state

투 고 일 : 2023. 1. 10. / 심 사 일 : 2023. 1. 15. ~ 2023.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3. 2. 20.

